

诺贝尔经济学奖揭晓,为何又是美国人

■ 周文 复旦大学教授



201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揭晓,西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大本营、美国芝加哥大学经济学家 Richard Thaler 获奖。诺奖频频颁给西方尤其是美国经济学家,对中国伟大的经济实践仍旧熟视无睹,这再度引发国人热议。

有人不解,中国这些年经济发展突飞猛进,背后必然有强大的经济学理论支撑,为何中国人却拿不到诺贝尔经济学奖?其实早在30年前,美国经济学家弗里德曼就说过,谁能解释中国经济,谁就会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经济学是致用之学。事实上,只有基于伟大实践、能够回应现实问题的经济学研究才是经济学的真谛。回望经济学发展的历程,真正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经济学研究或称经济学革命的,无不是因为对划时代重大现实问题的关注和回应。因此,只有能解决现实问题的经济学才是好的经济学。经济学的生命力和影响力在于能够解释经济现象,理论的重要性取决于被解释对象的重要性,理论的高度取决于回应重大现实问题的力度。

经济学毕竟是社会科学。经济实践的丰富多彩性决定着经济学理论的丰富多彩性。西方经济学的谱系再宏大,也不是经济学的全部。

能解决发达国家经济问题的经济学固然值得称道,但是能解决发展中国家经济问题的经济学同样是人类思想宝库中的明珠。地不分南北,理论创新不可以问东西。评判经济学的好坏,主要应该看效果,而不是论出身。从这一点看,诺贝尔经济学奖只是展示了西方经济学的研究成果,地域局限性十分明显,并不能代表经济学的高峰。更何况,经济学的科学性和创新性不是因为提出了什么,而是在于它能解决什么。西方经济学在西方经济危机面前屡屡受挫,已经证明了其理论具有的内在缺陷。

近些年,世界经济版图持续变化,全球增长动力面临大转型,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评委们却仍然固执地囿于对50年前经济学的理解,而且仅仅只聚焦于西方发达国家,以致经济学诺奖几十年来成了为西方人专设的奖项。这样的导向和理念,使经济学的研究禁锢于“象牙塔”,越来越抽象化、数学化,最多只能“束之高阁”,变成只是学者们把玩的游戏,由此也使经济学的研究与现实经济社会发展的距离越来越大,对于经济问题的解释力也越来越弱。

正是因为如此,近年来,一些学者不断质疑诺贝尔经济学奖是否违背了“为人类做出重要贡献”的授奖要求。世界形势在变,经济学理论创新的评价方式也应该变,可诺贝尔经济学奖却在这一变化中明显落伍了,显得越来越僵化。再这样如此下去,再不时俱

进,只会拉低诺贝尔奖的格调,其命运结局只能是被世界所淡化、所遗忘。

当代中国正经历着我国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也正在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这种前无古人的伟大实践,必将给理论创造、学术繁荣提供强大动力和广阔空间。

中国改革开放40年来,始终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断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不断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新的境界,在世界经济一片低迷时代开创出充满生机的中国经济发展道路,给国际社会提供了新的发展典范。改革开放之初,中国农村贫困人口高达7.7亿,贫困发生率达97.5%。短短30多年过去,7亿多人摆脱贫困。仅仅2013年至2016年,我国农村贫困人口由9899万人减少至4335万人,年均减少1391万人。

消除贫困,自古以来就是人类梦寐以求的理想。今天,全球范围内仍有7亿极端贫困人口,其中一半生活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1/3在南亚。如何找到一条适合自身、富有成效的减贫道路,许多发展中国家正在艰难探索。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反贫困斗争取得的巨大成就、成功经验,像一盏明灯照亮越来越广袤的大地,让全世界更多发展中国家从中看到了希望和方向。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数据,就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而言,2016年的欧洲和美国都乏善可陈,而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远超欧美发达国家之和。与此相对照,冰火两重天,这样的经济绩效令西方发达国家相形失色。

正是因为眼下在中国发生的变化,成就有目共睹,西方学者在中国都不约而同地提出全球正在经历一场“中国浪潮”。解码中国,说到底,“中国浪潮”的背后是中国道路的成功。

回望世界,时代的变化和我国发展的广度和深度远远超出了西方经济学理论的分析框架和思维范式,甚至颠覆了西方经济学的理论判断。与此相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一开始就不是“象牙塔”中的学问,一直伴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不断创新。因此,解决当代中国经济发展问题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立足点和生长点。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不但善于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指导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为目标的社会主义实践,而且在执政实践上不断开辟当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境界,不断丰富和发展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内容,从而使中国经济发展呈现

出喷薄而出的活跃局面。比如,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提出市场与政府的两点论、辩证法;关于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理论;关于推动新型工业化、信

▼ 链接

盘点:近1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及其主要成就

据诺贝尔奖官网消息,瑞典斯德哥尔摩当地时间10月9日,201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揭晓,美国经济学家、芝加哥大学教授理查德·泰勒因其在进行经济学领域的研究获奖。

近10年间,都有哪些人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而他们又有哪些成就呢?

2007年,美国经济学家莱昂尼德·赫维奇、埃里克·马斯金和罗杰·迈尔森。他们在创立和发展“机制设计理论”方面作出了贡献。“机制设计理论”最早由赫维奇提出,马斯金和迈尔森则进一步发展了这一理论。这一理论有助于经济学家、各国政府和企业识别在哪些情况下市场机制有效,哪些情况下市场机制无效。

2008年,美国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克鲁格曼整合了此前经济学界在国际贸易和地理经济学方面的研究,在自由贸易、全球化以及推动世界范围内城市化进程的动因方面形成了一套理论。他的新理论能够帮助解释自由贸易和全球化对世界经济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以及世界范围内城市化进程的驱动力等一系列重要问题。

2009年,美国经济学家埃莉诺·奥斯特罗姆和奥利弗·威廉森。奥斯特罗姆因为“在经济管理方面的分析、特别是对公共资源管理的分析”获奖,威廉森则因为“在经济管理方面的分析、特别是对公司边界问题的分析”获奖。埃莉诺·奥斯特罗姆和奥利弗·威廉森的研究证明了经济分析可用于解释大多数社会

组织形式。奥斯特罗姆的研究揭示了使用者组织是如何有效管理公共资源的。威廉森的研究则发展了有关公司作为一些架构安排解决利益冲突的理论。

2010年,美国经济学家彼得·戴蒙德和戴尔·莫滕森,以及具有英国和塞浦路斯双重国籍的经济学家克里斯托弗·皮萨里季斯这一奖项。这三名经济学家凭借对“经济政策如何影响失业率”理论的进一步分析,摘得201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桂冠。三人的存在可以解释许多经济现象,包括“为何在存在很多职位空缺的时候,仍有众多人失业”。三人建立的经济模型还有助于人们理解“规章制度和经济政策如何影响失业率、职位空缺和工资”。

2011年,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克里斯托弗·西姆斯以及纽约大学的托马斯·萨金特。西姆斯的贡献主要集中在对时间序列计量经济学和应用宏观经济学领域的研究方面。他研究短期经济政策的作用,反映出对宏观政策效果的关注。而萨金特作为理性预期学派的领袖人物,在宏观经济模型中预期的作用、动态经济理论与时间序列分析的关系等研究领域颇有建树。

2012年,美国经济学家阿尔文·罗思和劳埃德·沙普利,以表彰他们在“稳定匹配理论和市场设计实践”上所作的贡献。沙普利采用了所谓的合作博弈理论并比较了不同的匹配方法。其研究重点是如何使双方不愿打破当前的匹配状态,以保持匹配的稳定性。罗思的

在不断展示出越来越大的理论魅力和真理力量。我国学者应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既融通中外,又扎根中国大地,脚踏实地地把中国的经济研究好,把中国的经济问题解决好,在国际学术舞台上发出更多响亮的中国声音。因此,经济学诺奖颁不颁给中国的经济学家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中国要对世界有所贡献,特别是对世界经济发展贡献更多的中国智慧和

中国方案。

在此情势下,无论从经济学理论研究,还是从中国经济发展的表现,为之努力的中国经济学家们都配得上任何奖项。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发展好,让世界更多发展中国家分享发展的中国经验,比得一百个诺贝尔经济学奖都更重要。

贡献在于,他发现沙普利的理论能够阐明一些重要市场是如何在实践中运作的。通过一系列研究,他发现“稳定”是理解特定市场机制成功的关键因素。

2013年,美国经济学家尤金·法马、拉尔斯·彼得·汉森和罗伯特·席勒,他们因对资产价格的实证分析取得显著成就而获此殊荣。评选委员会指出,他们的研究成果奠定了人们目前对资产价格理解的基础,资产价格一方面依赖波动风险和风险态度,另一方面也

与行为偏差和市场摩擦相关。

2014年,法国经济学家让·梯若尔。他被誉为当代“天才经济学家”,累计发表过300多篇论文和11本专著。在当代经济学三个最前沿的研究领域博弈论、产业组织理论和激励理论均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他以对市场力量与调控领域研究的贡献而获奖,并打破了多年来美国经济学家垄断经济学奖的现象。

2015年,拥有英国和美国双重国籍的普林斯顿大学教授、知名微观经济学家安格斯·迪顿因研究消费、贫困和福利方面获得当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安格斯·迪顿最主要的学术贡献在于提供了定量测量家庭福利水平的工具,以此来更准确地定义和测量贫困,对更加有效地制定反贫困政策有着重要意义。

2016年,哈佛大学的奥利弗·哈特(Oliver Hart)、麻省理工学院的本格特·霍斯特罗姆(Bengt Holmström)荣获该奖项,获奖理由为对契约理论的贡献。



揭秘诺奖得主理查德·塞勒对行为经济学的贡献

▶▶▶ [上接 01]

4.行为金融理论。塞勒在行为金融研究学的研究方面贡献颇丰。在股票溢价之谜这个问题上,塞勒等(Shlomo & Thaler,1995)给出解释,当投资者经常性地评价他们的投资组合时,短视的厌恶损失就会令很大一部分投资者放弃股票投资的长期高回报率,而投资于具有稳定回报率的债券,因为股票收益在短期内具有很大的波动性和不确定性。根据弱势有效市场假说,一个投资者无法利用过去的价格信息来获得超额收益,也就是说股票价格纯粹服从随机游走,但塞勒等(De Bondt & Thaler,1985)曾发现了“输者赢者效应”,即投资者对过去输者组合过分悲观,对过去的赢者组合过分乐观,导致股价偏离其基本价值,待一段时间之后市场自动修正,前期的输者将赢得正的超额收益,前期赢者的超额收益则为负。据此,他们提出了预测股票收益的新方法:采用反转策略(contrarian strategy),买进过去3至5年内输者组合,卖出赢者组合,这一策略可以使投资者在未来3至5年内获得超额收益。塞勒等(De Bondt & Thaler,1985)认为过度反应产生于投资者并没有使用贝叶斯法则(Bayes theorem)对客观信念和行为进行调整,而是在忽视历史概率的情况下高估新信息的重要性,导致市场价格与基本价值产生过高或过低的偏离,这个结论也激励了更多的学者来研究和解释均值回归现象。塞勒(R.Thaler,1987a,1987b)对股票市场中的日历效应(calendar effect)也进行了研究。日历效应是指金融市场与日期相联系的非正常收益、非正常波动及其他非正常高阶矩,主要包括季节效应(seasonal effect)、月份效应(mon th of the year effect)、星期效应(week effect)和假日效应(holiday effect)。

塞勒在股市和股票研究方面取得了三项主要成果:(1)价格变动可能与影响资金进出

市场的习俗有关;(2)机构投资者对它们的投资组合进行季节性调整的原因是一种被文雅地称作“装饰门面”的活动;(3)对日历效应另一种不同类型的解释是,它们与好消息和坏消息发布时间点的选择有关;这三项研究成果均无法与有效市场假说相容,并且这些发现意味着资本资产定价理论亦被推翻。此外,塞勒等(Lee,Shleifer & Thaler,1990)对封闭式基金(closed-end funds)的研究成果丰硕:(1)新基金上市存在规律性表现;(2)封闭式基金通常均以相对于其净资产价值较大的折扣进行交易;(3)折价(或溢价)的变动范围很大,因不同时间、不同基金而异;(4)当封闭式基金通过兼并、变现或者转变为开放式基金而终止时,价格将与净资产价值趋于一致。塞勒的这四项发现有两个解释,一种是建立在基金管理者的错误行为之上,另一种建立在净资产价值的错误计算之上,并且塞勒等得到一个本质性启示,即“证券价格等于其内在价值”的论断只是一个可检验的命题,而不是一个公理。

二、塞勒对行为经济学理论的应用

塞勒在2000年后逐渐将其思想运用于分析消费者行为和政府政策之中,并利用助推和选择设计等思想来解释各种社会现象。

(一)助推与选择设计等思想应用 “助推”一词来自于塞勒与桑斯坦合著的标志性作品《助推》(Sunstein & Thaler,2008)一书。该书将我们引入一个比较和选择的世界,创造性地论述了如何运用选择设计这一新兴思想对人们施加助推力,从而使人们能够做出令自己更加健康、富有和自由的决策。作者分别对个人、社会、政府行为的研究范式和相关问题进行了比较全面的分析和总结,并阐述了助推力在实际生活中会产生颠覆性

的作用,并在其著作中提出了两大观点:(1)看似微不足道的社会现象会对人们的行为造成很大的影响,其实助推力无所不在,只是容易被我们忽略,而这当中选择设计师的存在对人的决定形成关键的影响。塞勒等将人类的思考方式分为两种:一种是不假思索的直觉,称为自动系统;另外一种是比较刻意的理性思考,称为省思系统。2008年以后塞勒分别从定锚、可得性、代表性等视角,具体阐述了近年来心理学家逐渐运用经验法则与偏见(或者说省思系统和自动系统)来进行的研究。与此同时,对于过度乐观和自信,比如投资者认为他们对股票价值了解详细,而他们实际知道的却并不全面,这在金融学中它也可以应用于解释过度波动、惯性和有足够的交易量以保证市场运行等现象。塞勒把过度自信也应用到了其他方面,如在寻找伴侣、创办公司或是作为电视股评家谋生时,人们会高估自己目前状况下的安全性,而不会采取合理的预防措施。由于人的惰性存在,即便是一种宁愿对自身有利,人们在面对这种情况时也会宁愿维持不变,因此略加助推则可以发挥更大的效益。(2)自由主义的温和专制(liberal mild despotism)中“自由”和“专制”并非矛盾,是选择设计师在不牺牲自由选择权的前提下,运用助推来帮助政府和人民改善生活。塞勒等利用行为经济学方法和手段来影响公共政策的制定,例如,如何提高贷款监管、改善医疗保险处方药、改革公立学校和婚姻制度等,甚至构建了一种新的思考模式,无论左翼政党还是右翼政党都可以共同使用这种思考模式,这就很有可能成为政府可行的“第三条道路”。

助推思想体现的是一种全新并且有效的政府管理模式,他们把这种模式称为“自由主义的温和专制”,并且进行了实践。桑斯坦的朋友巴拉克·奥巴马将行为主义观点融入到

了总统竞选当中,在奥巴马当选总统后任命桑斯坦担任政府“信息与规制事务”办公室主任一职;英国保守党领袖戴维·卡梅伦也曾直言不讳地称他很欣赏塞勒和桑斯坦的研究工作。

(二)消费者行为的研究应用 1、心理账户视角。塞勒(R.Thaler,1990a)用心理账户来分析行为,采用一种内在的控制机制,如今许多家庭都用这套机制来评估、调节和处理家庭的预算。他指出每个人都会使用心理账户,只是有的人不自知而已。通俗地说,为什么很多家庭主妇不会用交水费的钱来交房租?大家都明白钱是可替换的,但是当我们在心里设定不同的账户时,即默认不同账户间是不同的。这就可以引伸为企业为了控制支出,订立不同项目的预算,当企业需要购买一项重要的东西时,因为原先购买该物资的预算账户不够而不得支用。同样的,赌场中赌徒下赌注时也会用心理账户对自己的钱和赢来的钱进行区别对待(Thaler & John son,1990b)。善于使用心理账户对我们每个人都是很有价值的,生活可以变得轻松、有趣和安稳,这就相当于在我们心里设立一条无形的界线,让我们在目前区间内最大效益地安排生活。

2、社会感染力视角。塞勒等(Sunstein & Thaler,2003)认为社会感染力有两点比较重要:一是多数人都是把别人作为学习对象;二是社会感染力是达到效益最大化的一种很有效的方式。社会感染力可以分为两种类型:第一种与氛围有关,当很多人都表现出同样的行为或者是抱着同样的想法时,他们的行为或想法就会相互影响。第二种来自周围人的压力,如果你在乎别人怎么看你,那么就会迫于外界的压力来保持和大多数人同样的行为。我们经常受到其他人饮食习惯的影响,比如,一个食量小的人在食量大的人群中会吃

得更多。同样,在公选候选人或者是政党时,他们常会强调多数人已经转而支持其推荐的人选,希望说出这句话就能让它成真。一旦感觉到民众已经集体背离某位候选人时,那个人离失败也就不远了。社会感染力除了影响饮食和政治,甚至会左右金融市场,就连投机风潮和金融危机都与它脱不了关系。因此,塞勒建议政策制定者可以从中学到当人们开始互相影响时,市场的急速上扬对投资人以及整体经济也会产生不容忽视的风险。塞勒还提醒我们,选择设计师要让人们知道其他人的选择,就可以通过助推去改变人们的行为。

3、信息技术进步视角。塞勒等在《帮助消费者认清自己》(Kamenica, Mullainathan & Thaler,2011)一文中提出,现代的信息技术使得出售方比消费者本身更加了解消费者的购物习惯。比如,通信供应(JP)商可以保留和分析消费者具体的通讯记录与详细的使用细节。同样,信用卡公司可以通过顾客的生活细节来判断其缴纳滞纳金的可能性。在很多的例子中,这些信息允许卖方提高他们的服务,而这种信息不对称让卖方利用信息的优势去构建特别的优惠来使消费者过度消费。我们将这称为目标反转(adverse targeting),即信息不对称容易造成逆向选择。但是从另外一个层面上说,现代技术也会让消费者成为一个更好的购物者,当我们提供价格和使用数据给消费者时,消费者就可以反转信息不对称。按照RECAP规则,即记录(Record)、评估(Evaluate)、比较不同价格(Compare Alternative Price)的规则,可以帮助消费者明白真正价值并做出更好的选择,与此同时,RECAP也提供了一种监控的方式来防止滥用价格策略。规则的制定者将会运用可读性数据和信息透明性来帮助市场进行更好的自我管理。

(下转 03 版)